

# 三桂岂是姜伯约？ ——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

葛兆光

## 小引： 山海关边勾起历史记忆

自打李朝朝鲜国王不得不年年向大清帝国贺岁和朝觐以来，从顺治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里，朝鲜使团离开朝鲜进入中国边境栅门后，在中国境内总是沿着规定的路线，从凤凰城到辽东，经沈阳到山海关，进了山海关则经永平府、丰润县到蓟州，然后，经东边的三河、通州进入北京。据说，路途差不多都是一个半月，因此一代一代的使者，不仅总是在一个个驿站中火（中饭），而且总是无奈地观看同样的山光水色，也无奈地重复经历相似的风雪严寒，当然也可以方便地借用前辈现成诗句来寄写心情<sup>1</sup>。

不过，山海关似乎是风景和心情的转折点，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到了这里的朝鲜使臣不仅可以见到大海，视野突然开阔，而且目的地京城在望，这意味着后半程风平浪静。特别是，在朝鲜使者眼中，山海关还是划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关外虽然和朝鲜相连，过去也曾是大明旧地，但是毕竟地处东隅，而且因为是满族旧巢，让朝鲜那些出身两班的士人使者觉得“殊有戎狄风习”，而关内尽管也“渐染羯胡之习”，但是，心中总是向往大明的朝鲜使者，却总觉得“人物渐渐繁盛”<sup>2</sup>，因而入了山海关，就仿佛进了文明之地，心情格外愉悦。

于是，他们不免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风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笔墨。至今我们看到数以百计的燕行文献中，有不少在这里流连光景的作品。只是因为朝鲜人根深蒂固地蔑视胡虏的心理，让他们总觉得中国一旦沦入满清，便陷入无极的悲情世界，一切都仿佛带有凄凉。山海关也不例外，这里的孟姜女庙，原本是文人的吟咏题材，却总让他们想到笼罩天地、哭倒长城的悲切。而旁边的孔庙，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师的场所，却常被他们看成是礼崩乐坏、文明沦丧的征兆<sup>3</sup>。

---

<sup>1</sup> 李（土+甲）（1737-1795，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谢恩副使）《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中记载路程说，“自凤城到沈阳，四百四十三里，沈阳到山海关八百三里，山海关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计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实为二千五十里”，自沈阳到山海关，是中节，山海关以西，则是终节。但他又说明，明代原来贡路是从辽东直取鞍山，自海州卫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则改经沈阳，所以，到十三山才见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滨。《燕行录全集》五十二卷，634-637页。

<sup>2</sup> 吴道一（1645-1703，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出使）《丙寅燕行日程》，《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页。

<sup>3</sup> 韩德厚（雍正十年1732年与李宜显同赴北京）《承旨公燕行日记》，记载山海关附近的文庙“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物事。余于一路上及留馆之时，辄求儒生经士，而晓解文字者绝稀，间或有秀才为名者，而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见《燕行录选集》下册，530页。

在这里,让他们常常想到的,还有一个与山海关相关的人物,这就是当年为大明镇守此地,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1612-1678)<sup>4</sup>。

## 一,“中华乱贼”:乍逢巨变之初的评价

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断地传来。隔着满洲人早已占领的辽东,当时已被满清控制的朝鲜君臣,只能通过种种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来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国,在犯上作乱的乱贼和伺机进逼的女真双重压迫下,早已节节溃败,渐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煤山的槐树上自缢,这个消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无比悲哀。到了五月,当他们经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个月“吴三桂开关出降”,清兵已经“带神威大将军炮兵,及吴总兵马、步兵,前驱北京”的时候,就更是绝望,《李朝实录》记载,不要说国王君臣,连“輿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sup>5</sup>。

吴三桂开关纳降,清人直取北京,成为明清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吴三桂成了朝鲜人眼中的历史罪人。吴三桂作为明朝大将,不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开门揖盗,引鞑虏进入关内,使神州沦陷满清之手,在始终眷念大明帝国的朝鲜人看来,这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严守华夷界限的朝鲜人,对于忠烈与叛逆的爱憎比中国人还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谢恩的朝鲜使团书状(类似书记官)成以性(1595-1664)路过连山驿,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寿的碑文前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祖氏“当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缘(祖)大寿惜一死,四世勋业一朝扫尽,而今独两石门余存,适足为后人唾骂之资耳”,说到这里,话锋突然一转,便说到山海关和吴三桂,他说,“三桂以大寿外侄,颇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为敌国所惮。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噫!”两天之后,使团一行走到山海关,他不由“举目相看,反袂而拭泪”,感慨地吟道“连云粉堞浑依旧,百年文物不胜悲”<sup>6</sup>。

得意的是吴三桂,悲切的是朝鲜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头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吴三桂还是大清宠臣,不仅他自己位极人臣,连他父祖的坟墓也极尽荣华。那些年中,朝鲜使者每到山海关,都会看到为吴三桂祖坟守灵的奢华景象。据说,吴三桂让其兄吴三凤看守坟莹,守冢人数达到三百,“俾渠等备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时之祀”<sup>7</sup>,这让始终对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鲜文人感到既无奈又愤怒。

这也许是朝鲜人旁观者清?也许是朝鲜人爱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烈皇小识》就推测说,他

<sup>4</sup> 吴伟业《圆圆曲》,《吴梅村诗集》卷三,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sup>5</sup> 《李朝实录(仁祖)》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月甲午,国史编纂委员会,首尔,1973。

<sup>6</sup> 成以性《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页。

<sup>7</sup> 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全集》第二十卷,221页。

降清是为了父亲被李自成所逼，“索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是为“孝”，但还算是为“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sup>8</sup>，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哪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

可是，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所以，他们始终在默默地祈祷大明江山的恢复，诅咒着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原因很简单，对叛徒的仇恨有时甚至超越对蛮夷的不屑，因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sup>9</sup>，却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

## 二，蠢蠢欲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的复杂心情

可是，到了康熙年间事情却有一些微妙变化。还是让我们从康熙十二年（1673）说起，这一年冬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朝鲜人很快就听到传闻。通过朝贡使团从中国带来的种种消息，朝鲜君臣默默地观察着清朝政局变化。

第二年（1674）的三月，作为谢恩使到北京出使的金寿恒，特别派译官金时征快马加鞭赶回京城，带来一个惊人的传闻，他说，有“朱姓人，诈称崇祯皇帝第三子，聚众万余，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放火北京城中，因作乱，事觉就擒”。很有趣的是，从起兵之日起，似乎吴三桂又和“大明”联系在一起，这无端地勾起一些朝鲜文人的“复明”之心。五月十六日，朝鲜官员罗硕佐、赵显期等人接连上疏，说“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北京，天下事变，迫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在这一年，还有一个叫做柳润的人，根据占星术作出了惊人的预测，向朝鲜国王说“见天文，明必兴，胡必亡”，而且断言吴三桂要再造大明，“清国之势，似难久保”<sup>10</sup>。

不过，朝鲜君臣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毕竟事情太大。领议政金寿兴说，虽然吴三桂只是自称“大将军”而不称皇帝，也许他有所拥戴，但情况还不很清楚，“我国不能探知，诚

---

<sup>8</sup> 以上可以参看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28期，85-108页，台北，2000年6月。感谢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韵柔从台湾为我复制这一论文。

<sup>9</sup> 孙万雄《燕行日记》，写于康熙十六年（1677），《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页。

<sup>10</sup> 《肃宗实录》卷一，25页。转引自庄吉发《他山之石——朝鲜君臣论盛清皇帝》，载李国祁编《郭廷以先生百岁生日纪念史学论文集》8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

可郁郁矣”。朝鲜国王更是小心，因为“筵中说话之宣泄外间，近日尤甚”<sup>11</sup>，他怕惹出麻烦，当年江华岛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记忆还深刻地留在心中，清兵毕竟很强大，他不能轻易说话。何况他也怀疑，吴三桂是否真的要有所拥戴，是否真的是复明？好像还很难说。到了八月，尽管君臣反复讨论，但由于情报困难，对吴三桂是否真的“拥立朱氏子孙”，朝鲜人还是搞不清楚，而此时朝鲜已经换了国王，显宗老去，肃宗在这一年即位成为新的国王。

新国王总有新气象，刚刚上台的肃宗好像心里也有些蠢蠢欲动，这一年（1674）十一月，出使北京的灵慎君李滢回国途中，刚刚走到那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山海关，就急不可耐地派人飞速回到京城先报告消息，说大清帝国已经麻烦重重，按照他的说法，康熙皇帝很无能，遇到有捷报就乱吹牛，一旦是坏消息就死瞒，“年少性急，近因丧患兵乱，心气暴发，不能自定。诸王诸将亦无智虑之人”，他还说，有一个汉人告诉他们，“吴三桂立朱氏后……已据有南方三省之地，而处处起兵应之”<sup>12</sup>。紧接着，他们还听说吴三桂发布了《反清檄文》，抨击清人是“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且宣称自己“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sup>13</sup>。似乎他确实要恢复大明江山，这使一些朝鲜人觉得，可能吴三桂真的是一个夏臣靡、程婴、李陵一流人物，在《李朝实录》中，曾把这份檄文当作吴三桂的真心话全文照录，说吴三桂“内怀恢复之志”，而且一连用了这三个典故，大大地称赞吴三桂智勇深沉，“其于明亡三十余年，奉朱氏复兴，则与夏臣靡相似，其与宫人太监匿一块保全，则与程婴相似，其屈膝穹庐而终奋大辱之积志，即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sup>14</sup>。

传说中，夏代寒浞杀害后羿篡夺王位，而夏臣靡苦心孤诣，收罗遗民，并经营多年，终于辅佐少康中兴夏王朝，是卧薪尝胆的忠臣；春秋时的程婴则是著名的《赵氏孤儿》中的主角，他收养被灭门的赵朔之子，忍辱负重成就友人大义，是可歌可泣的烈士；至于李陵，则是汉武帝时代战败不得已才降匈奴的将门之后，司马迁说他“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这次“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三个人都是坚韧之人，其不死更难于死。朝鲜人未必真的相信吴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但仍然如此夸张地想象这是反清义举，其实只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明希望。

---

<sup>11</sup> 《显宗改修实录》二十八卷，十五年（康熙十三，1674）五月二十日。

<sup>12</sup> 《肃宗实录》一卷，肃宗元年（1674）十一月十三日。

<sup>13</sup> 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卷二《吴三桂檄》，52-54页，东方书店，东京，1970。对于这篇檄文的真伪，1931年朱希祖有一些讨论，见朱希祖《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类·明清卷）第一册，393-401页，中华书局，2009。

<sup>14</sup>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的这篇檄文都不见收录。原因很可能是，官方既不愿意人们读到这篇充满汉族民族情绪和大明历史意识的文字，也不愿意让涉及历史机密的消息广为传播，因而把它当作悖谬之文禁止，而人们既害怕涉及政治忌讳招惹迫害，又把吴三桂的宣誓当作笑柄，觉得这只是惺惺作态，以致于这份历史资料不存于中国，倒保留在日本和朝鲜的记忆中。先是收在日本人编的《华夷变态》中，接着又在朝鲜国王那里引起极大关注，被收录在《李朝实录（肃宗）》卷四，16页，肃宗元年（1675）六月己未。可参看前引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

### 三，按兵不动：等待的结果

那个时候仿佛捷报频传，西边的吴三桂好像声势不小，东海的郑氏似乎也有所动作，辩不清真假的消息接踵而至。一会儿使臣传言，说吴三桂、耿精忠和郑锦舍“连横合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不动一兵，传檄而定，声势日振，南方郡邑大半归顺”；一会儿探马来报，说吴三桂有苗奴五六千，“沮齿漆膝，白布裹头，其目深而黑，其剑长而广，其勇如飞，其战无敌”，又地险兵利，坚壁不出。而清兵虽有四亲王十大将率八万兵，但“上年粮绝，人相食，猎獐鹿，并其毛食之”<sup>15</sup>。纷至沓来的消息，搞得朝鲜君臣有些心痒难耐，有人上书进言说，“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如果“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sup>16</sup>。

不过，毕竟“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中国兴亡又不是朝鲜兴亡，所以，这些年里他们始终在观风向、走钢丝。一些大臣如南九万就说，别信道听途说，也别轻举妄动，要想复仇，先得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设令国家真有克诘戎兵，转弱为强之事，亦且隐闭藏匿，不使敌人有所窥测，况于初无一事之措处，而先出治兵之虚声哉？”虽然有人（如水原儒生李启祥）自告奋勇，要代朝鲜国王和郑氏联络沟通，但被当朝大臣（领议政许积）斥责为不负责任而罢。虽然清朝使团曾经到朝鲜来要挟，让国王给皇帝送“数百柄鸟銃”，以搏大清欢心，并说这样一来“皇帝必大喜”，但朝鲜大臣（右议政权大运）却反对这种做法，说“岂可只信渠说而轻送重器乎？”<sup>17</sup>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并不为外言所动。有一次，日本对马岛主平义真来问“华戎兵事”，居心叵测地鼓动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听了以后也只是笑笑<sup>18</sup>，因为他们深知，“倭性狡猾，而此书辞，明是卖哄荧惑之言，窥伺之态，有不可测知”<sup>19</sup>。

特别是，尽管痛恨满清而眷念大明的朝鲜文人心存幻想，但毕竟他们对吴三桂开门揖盗的行为仍然记忆深刻。康熙十六年（1677），当吴三桂还在南方和清廷对峙的时候，沙河驿原来四时上供的吴氏父祖坟墓，就已经被清朝官方捣毁，这一年，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记载，“云南举事之后，（清廷）发葬磔尸，以戮辱之。其父冢则只纳一部空椁，不获其尸，但掘毁而已”<sup>20</sup>。他觉得，吴三桂不仅引清兵入关，把大明江山拱手送人，而且一方面拒不赴李自成

<sup>15</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七，肃宗四年（1678）即康熙十七年三月六日（丁丑）。

<sup>16</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六，肃宗三年（1677）十一月九日。撰写实录的史臣也说，“天道悔祸于赤县，而人心未忘乎朱氏，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洒仁祖之遗耻，报神宗之至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忠节，犹有不泯”。可见这种想法当时很流行。

<sup>17</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三月二日。

<sup>18</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三，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六月三日。

<sup>19</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四，肃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十一月一日。平义真的信中说，“大明旧臣吴三桂，辅翊先帝幼子，久怀立孤，丕运恢复之筹，分箴倡良将，杖节举义兵，方欲树创业守成之功，而今业已图南北两京……贵国地近鞞鞞，道通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耶”。

<sup>20</sup>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89页。

之召，害得父亲丢了性命，一方面又举事造反，让祖父尸体被清人弃骨扬灰，真是既不忠又不孝。所以，他在日记中重重地记了一笔，“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胤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sup>21</sup>。

久久等待之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终于传来了吴三桂兵败身死的确实消息，渐渐他们也知道了，“三桂即位于衡山之阳，国号大周，改元弘化，而原无立朱氏之事”<sup>22</sup>，于是他们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因为吴三桂并不是为“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而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

#### 四，辽东见闻：寻访散在关外的吴三桂旧部

不过，有时候人的心理很奇怪，本来在观念上被看成是从逆的叛贼，一旦和自己面对面，观感也有一些微妙变化，真所谓“耳闻不如眼见，亲近改变旧嫌”。在吴三桂败死之后那几年，作为反复无常的“贰臣”，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迅速被口诛笔伐。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sup>23</sup>；汉族士人觉得他朝三暮四，为一己私欲而绝不是“反清复明”。所以，尽管他在起兵时发布过那篇《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意外的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鬼话，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这种评价当然影响了朝鲜人，他们本来就对吴三桂没有好感，一直鄙夷这个反复无常的奸雄，在他败亡后也会跟着抨击，像康熙二十二年，著名的朝鲜文人金锡胄（1634-1684）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就写诗说，“次第边城失，当年此亦孤。深仇天岂戴？大盗地尽输。西北崩隍在，东南半壁无。白头还举事，吾且尔何诛”<sup>24</sup>。但有趣的是，已经渐渐接受“大清”的汉人这样说倒也罢了，原本把清帝国视为“夷狄”的朝鲜人，有时也会在对吴三桂“反清复明”的想象之中，对吴三桂的观感有一些彷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犹疑不定，这种犹疑似乎一直到延续到吴三桂败亡之后。尽管希望最终变为失望，但那种复杂的希望，却很容易引起朝鲜人对吴三桂的另类想象。特别是，当一些朝鲜使臣来到辽东亲见吴三桂旧部，和他们有了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竟然对吴三桂产生了另一种感觉。

这些吴三桂旧部因为失败，被清廷流放在东北各处<sup>25</sup>。或许是清帝国觉得，将逆臣放在自己的老巢可以稍稍放心罢，吴三桂兵败后，一批“从逆”官员被流放到关外，他们或为僧人，

<sup>21</sup>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218页。

<sup>22</sup> 《李朝实录（肃宗）》卷十一，肃宗七年（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十八日，冬至兼谢恩使金寿兴向肃宗的禀报。

<sup>23</sup>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六，14页，康熙十三年二月辛酉。

<sup>24</sup> 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卷六，景仁文化社，603册，327页。又，此卷亦见于金锡胄《【手十寿】椒录》卷下，收入《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四卷。

<sup>25</sup> 关于东北流人，谢国祯先生有《清初东北流人考》一文论之甚详，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重印本，2006。但有关三藩之乱后的流人，主要讨论陈梦雷等著名人物，未及这些被流放的非著名士人。

或为塾师，或为游民。由于这些吴三桂旧部恰恰在朝鲜使者路经的辽阳、沈阳等地居住，因此常常和朝鲜使团不期而遇。在普遍文化并不高的关外，喜欢炫耀文采的朝鲜文人遇到这些精通或粗通文墨的汉人，常常会格外高兴。三藩之乱平定后不久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鲜使臣吴道一（1645-1703）在沈阳遇见一个叫做刘君德的文人，在笔谈中，他发现这个人“文理粲然，甚不易得”。询问之下，原来他是关内的汉族人，曾在云南吴三桂那里做翰林侍读，他对于“性理”和“词学”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尚藻华而细理致”。他对朝鲜使者说，那些空洞的性理之学不能感动人，所谓“濂洛风雅”只是“酸气扑人”，倒是“精诣动人处，盖深于词学者”。虽然恪守朱子理学的朝鲜文人吴道一并不认同这番议论，但也觉得他的这番议论很是新鲜，更何况他能够引经据典，让朝鲜人觉得，他真是有学问的“云南学士”。不过，当话题渐深，吴道一问到吴三桂及“云南兵败城陷时事”的时候，这个刘君德公然回答说，“吴平西（吴三桂封平西王）有勇力胆略，不幸婴疾，心血枯尽而死，其孙世璠亦英明文雅，济以浑厚，兵戈之中，不废书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将自裁，宦侍辈扶掖止之，奋拳大骂曰：自古岂有降天子哉，即刎颈而死，皇后亦与之同死”。让朝鲜使者很是吃惊。而当刘君德说到自己，痛苦万端，写下“为贼所生擒，求死不得，致有今日名义扫地，愧罪千万”这番话，并且凄咽泣下的时候，更让惊愕之中的朝鲜正副使不知所措，只好百般安慰，还赠送了朝鲜的壮白纸、小刀、扇子和笔墨<sup>26</sup>。

这使朝鲜人很感困惑。有一个朝鲜使者李宜万在沈阳西街见到被流放的文人，即号称剩人和尚（又自号辱翁）的林本裕，他曾小心翼翼地询问吴三桂的真心，“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林本裕虽然谨慎，但还是回答说，“事成则忠，事败则逆”，因为他觉得，吴三桂的失策只是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想儿子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而已，这让朝鲜使者深深感受到他对吴三桂爱之深，责之切<sup>27</sup>。林本裕受到清廷严格监管，他的诗文被清廷下令禁毁，据说，他每次笔谈涉及“清朝事，则辄呼烛烧之”<sup>28</sup>，让朝鲜人感觉他“枢机之周慎”。但其他人却不同，往往在外国使者面前放胆直言。比如吴道一在辽东曾见到一个叫郭垣的人，他祖籍江西南昌，父亲郭朝瑞在吴三桂手下从刑部郎中、鸿胪卿、大理正卿，一直做到通政司，吴三桂兵败后被安置在周流河居住，大概郭垣就是随着家庭被流放关外的。当吴道一询问郭垣“吴藩败时有杀身取义者否”这一问题时，他先举出吏部郎中穆廷选，并大大地赞扬他“城陷之日，夫妻俱从容就死”，再举出吏部尚书方光琛，“为虏所擒，愤骂不屈而死”，还说“其余殉节者亦颇有之，今难一一备陈”<sup>29</sup>。而吴道一遇到的另一个云南流放文人朱秀，也好像始终没有改变他拥戴吴三桂的立场，在被问到“清国既统一天下，吴平西何不服

<sup>26</sup>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55页。

<sup>27</sup> 李宜万《入沈记》附〈闻见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81-283页。

<sup>28</sup> 同上李宜万《入沈记》附〈闻见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83页。

<sup>29</sup>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57页。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朝鲜使者金昌业、崔德中又再次见到郭垣，这时吴三桂已经死了三十五年，可他仍然坚持相信，吴三桂是“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见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一，《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46页。

事，以享富贵，而浪取灭亡之祸”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但也很含蓄地回答说，“自有万世公论，今不必烦问，亦不敢烦说”<sup>30</sup>。

与其说吴三桂部下眷念大明，倒不如说他们始终反清。他们对清王朝的敌意，让他们心中充满愤懑和怨毒。当他们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总会特意介绍那些与清王朝格格不入的人物，像朱秀给吴道一介绍谁是“当世名士”的时候，他举出的一个是虽然“仕于清，不容而退隐”的江南汪远，一个是被迫赴举却以“亲老为解”恸哭不受功名的陕西李因笃，这让朝鲜人觉得“近来中国沦于左衽，而文章节义之士，尚不乏人”<sup>31</sup>。当朝鲜人向他们问起吴三桂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固执地赞扬旧日领袖，像郭垣回答金昌业“吴王勇略如何，身材大小如何，髯须多少如何”这一问的时候，这个其实并未真的见过吴三桂，也未必真的经历过三藩之乱的郭垣，却也言之凿凿地说，“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sup>32</sup>。另一个叫李素的人，在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也回忆说，“吴王在云南，遇士卒善饮酒，每遇戏，好点岳武穆事，见之大哭，仍曰：天下如此藩竟不是人。言讫复哭，哭罢复饮，此可见其志所在也。后来事虽不厌人意，要是雄杰间世人也”<sup>33</sup>。

冬去春来，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天朝鲜使团返回朝鲜途经沈阳时，吴道一又遇到了刘君德，故人相逢，彼此格外亲热。由于感到清国已经安定，复明往事已成幻梦，而朝鲜使团也经历了北京一月的所见所闻，于是，吴道一在笔谈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燕京时，闻清朝皇帝酷好文辞云，先生亦有所闻否”。话一出口，吴道一也许觉得颇有不妥，便解释说“此等事非所敢问，而妄恃见许，敢此烦问”。而刘君德仍在纸上写道，“酷好文辞，喜奖文士，信然信然。但仆等局外之人，故闻之亦等泰越耳”。当吴道一再次问到，“闻清皇蠲除民赋，慰悦四方，云然否？”刘君德便无奈地用笔回答说“上之美意，则或有之，但臣下奉行不力，恐徒成空文”。吴道一明白，这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极限了。于是便请刘君德赋诗书纸以作纪念，刘君德写了一首唐人绝句给他，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用“悲歌”之辞，用“剧孟”之典，可以想见他无力回天的苍凉心境<sup>34</sup>。

#### 四，“闲坐说玄宗”：朝鲜使者听吴三桂旧部说天宝遗事

“关外年年经风雪，辽东岁岁逢旧人”，从三藩之乱后，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初的若干年中，很多朝鲜使者都在辽东遇见吴三桂旧部下或他们的后人。在这个满人龙兴故地，打心底里

<sup>30</sup>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97页。

<sup>31</sup>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96页。

<sup>32</sup>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四，《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228页。

<sup>33</sup>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91页。

<sup>34</sup> 也许是受到吴三桂旧部的刺激？吴道一觉得记载凤凰城到山海关没有军队，认为“盖清人不但专意南方，不以我国为虑。以弓马驰突为能事，至于关防城守等事，不甚致力，盖其习俗然也”，他觉得“诚得精兵数万，一渡辽河，则关外千余里，庶有长驱破竹之势，而一任其据有神器械，肆然称帝，直欲发一恸也”。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165页。



瞧不上满人的朝鲜使者，似乎觉得这些汉人倒是有文化的笔谈对手。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1658-1721）在途中又曾遇见了郭垣和他的父亲郭朝瑞，遇见了江西南昌人金某，康熙六十年，李正臣（1660-1727）则遇见六十四岁的扬州人、善于推步之术的蒋寅<sup>35</sup>，雍正元年（1723），李宜万（1650-1736）在沈阳见到了号称“辽东三老”之一的林本裕（1652-1737以后）<sup>36</sup>，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1691-?）还再一次见到已八十六岁的林本裕，这时离吴三桂败死，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

亲见亲闻吴三桂旧部听他们叙述往昔，给他们一个迷离的印象和含糊的故事，这个印象打散了记忆，这个故事搅乱了历史，让他们的感性和理性产生冲突。历史褒贬常常表现的是“后见之明”或者“从众之说”。当时人对当时事，总不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当局者迷，事后书写的历史书，剩下手术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图式的准确，却筛掉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面对面笔谈的是朝鲜使者和吴三桂旧部，朝鲜使者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必用事后的政治伦理去评判。

我们惊讶的只是，这批吴三桂旧部竟然如此固执地维护着吴三桂的死后声誉，坚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对立立场，他们甚至不惜向朝鲜出卖大清的情报，这倒是过去不曾知道的。举一个例子罢。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鲜人赵师锡为了刺探清国的政治情报，曾经派了人向吴三桂旧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听<sup>37</sup>，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亲，他住在离沈阳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来，他曾多次见到朝鲜使团官员，认识不少朝鲜文人如南九万、崔锡升等。当他接到赵师锡的来信，就立马回信给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时，“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康熙）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他还告诉朝鲜人说，康熙不听有关“内远声色，外绝游田，息兵养民”的好言相劝，却把谏言的人打了一顿，还“亲执杖以撞之，体无完肤”等等。他特别向朝鲜官方透露吴三桂故地云南情况，说征服云南的大清官员腐败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抚绥不善，俱有负固之心，且招纳流亡，收留平西王下旧人更多，是有待时而动之意也。”<sup>38</sup>

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复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从他不惜当密探，给朝鲜通风报信的架式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他所说的情报迹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是“亡国臣仆，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愿意披沥肝胆，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对钱财的贪恋，他在信中说，如果朝鲜能够给他“少加赈恤，以济涸辙之鱼”的话，他愿意作朝鲜的“侦事之人”，把情报上呈“贵国主”。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单纯，所以在二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周流河又见到此人，已经察觉他并不可

<sup>35</sup>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235页。

<sup>36</sup> 参看李宜万《入沈记》，即《家山全书农隐遗稿》中之两卷，《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279页。

<sup>37</sup> 据金昌业记载，郭氏之父是吴的刑部郎中，后转鸿胪正卿，三任大理正卿转通政使。

<sup>38</sup> 《李朝实录》（肃宗实录）第15卷，朝鲜肃宗十年（1684）12月3日。

靠，金昌业在日记里说，他“颇有文翰，而为人浮诞，言不实云”<sup>39</sup>。但是，当时的朝鲜人一方面出于对满清的仇视，一方面出于对情报的需要，仍觉得这个吴三桂旧部“情理实为矜恻”，所以就连国王也下令，“其情诚可矜，使臣之行，优赉盘缠，以周其急可也”。

今天，也许我们不必讨论他出卖清国情报给朝鲜人是否“卖国”，也不必强调他以夸诞通报以换取钱财是否“可耻”，只是朝鲜人记载的他的举动以及关外吴三桂旧部的言行，处处让人觉得这些旧部对吴三桂，真是有相当奇怪的忠诚和固执。

### 尾声：盖棺论定身后事

吴三桂和他的部下未必是“怀念故国”而拥戴大明，他们起事恐怕只是为了“撤藩”而反清。朝鲜人未必赞成吴三桂，却是真心地拥戴大明。这一点到了康熙末年，朝鲜文人也渐渐清楚，便不再对吴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锡胄的后人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国时，虽然对这个“世人皆曰杀”的吴三桂是否“开关纳清为罪”感到疑惑，说当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吴三桂无法自保，更无法杀逆贼（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义，不与清兵并力，则毕竟见破于自成，而清兵亦自入关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最重要的罪过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号，竟至败灭，丧失名节”<sup>40</sup>。

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团出使清国。在辽东一地看到四块大碑，传说中此地乃是吴三桂塚，可他看来去看去，发现四块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员的神道碑，并没有吴三桂和他的家人，显然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于是便询问同行的翻译金庆门。金庆门是个极其精通中国事务的译官<sup>41</sup>，他回答说，自从清帝剿灭三藩之后，“尽杀三桂之九族，尽掘三桂之先塚。况三桂死于南方，岂葬于此”。说到这里，他细细地向李正臣叙述了吴三桂的故事：

甲申闯贼之变，大明覆亡，此际吴三桂持重兵守大藩。不顾父死，请兵于清朝，杀贼报仇，天下之论三桂者，毁誉纷纷，要观其末梢所为。其后三桂果起兵，几得天下半。旋乎身死而兵败，前日之誉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气焉。

但是他告诉李正臣说，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十年前他在留守凤凰城的时候，曾和流放到那里的吴三桂旧部叙谈，“尽得其事颠末甚详”，他说——

盖其反清朝，非为故君之地，实自为之计也。初则受封为平西王，俄奉清朝皇帝之命，攻永历皇帝于缅甸，生擒永历皇帝，俾绝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地。及复举事，自称大

<sup>39</sup>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四，《燕行录全集》三十二卷，228页。

<sup>40</sup> 金昌业《燕行日记》卷二，《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一卷，390页。

<sup>41</sup> 金庆门的事迹，可参见金庆门撰《通文馆志》卷首，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影印本，2007。

周，建元昭武，则其身死兵败者，不必清朝威武之所加，想应明朝列圣在天之灵，阴有以灭绝之也。其无父无君之罪，可胜诛哉？<sup>42</sup>

这一席话说得李正臣如梦方醒。这时，历史和价值都很简单明了，无论是大清国官方“十恶不赦”的定论，还是汉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怀，还是朝鲜官员怀念大明鄙视大清的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吴三桂钉在了耻辱柱上。几年后，朝鲜使臣赵文命在路上想起吴三桂，就写了一首诗，说：

人言三桂心犹汉，我识通天罪莫逃。当日若兴真义旅，白头宁着柘黄袍<sup>43</sup>。

时势毕竟比人强，岁月也能磨销记忆。再过十来年，就连曾经对吴三桂抱有极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认大清国皇帝的新政，是“宽仁盛德，敬宗睦族”<sup>44</sup>。到了三藩之乱平定六十年之后，这件事情早已在人们心中淡去，无论在汉族文人还是在朝鲜文人心中，吴三桂已经是不必再说的“贰臣”和“逆贼”，朝鲜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评价已经不再冲突。虽然，一个叫做卢以渐（1720-1788）的朝鲜文人想起了吴三桂的时候，还偶然地联想到了图谋恢复汉室不幸身死的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约，因为他“终作开门纳贼之人”<sup>45</sup>。

2010年8月22日初稿于上海

---

<sup>42</sup>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253页。

<sup>43</sup> 赵文命《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105页。

<sup>44</sup> 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七卷，448-449页。

<sup>45</sup>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65-66页。